



## 卜凯的中国农村调查

叶公平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卜凯（John Lossing Buck）在中国农村组织了范围最广的乡村调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这段时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宝贵资料。他据此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被尊为当时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甚至可以说，他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先驱，其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

卜凯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于美国纽约州达奇斯县（Dutchess County）的快乐谷（Pleasant valley），另有资料说他生于该县的拉格兰奇（LaGrange）。说起达奇斯县，如今的大多数纽约人并不陌生：它不仅凭借距纽约市仅六十英里距离被纽约人称为“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成为许多在纽约工作的人居住地的首选，而且还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出生地，达奇斯县海德公园还设有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陈列馆，收藏相关档案。卜凯英文名约翰·洛辛（John Lossing）来源于他曾祖母 Elizabeth Lossing 的兄弟本森·约翰·洛辛（Benson John Lossing）——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不过因为叫 John 的人太多，家乡的人都叫卜凯为 Lossing。卜凯的父亲是当地长老教会的长老，信仰虔诚。卜凯受父亲的深刻影响，后来他到

中国，最初身份就是长老教会的传教士。而他一个弟弟，也去了非洲传教。卜凯的另一个弟弟克利福德（Clifford）在务农之余，致力于研究达奇斯县的历史和他的家族史，成就斐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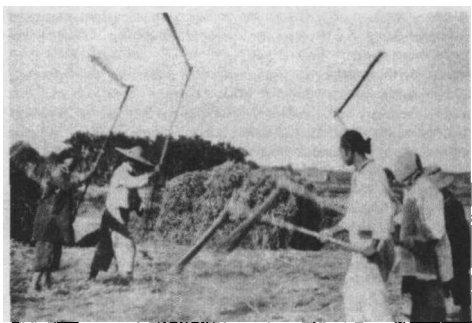
卜凯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当时又叫纽约州立农学院，免收学费。读书时他就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并加入中国研究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发起人是研究生芮思娄（J.H.Reisner），后来成为中国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和卜凯的上司。读书之余，为了赚取足够的生活费，卜凯想了个办法：他先是租了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然后把房间分租给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还请来专门的厨师烧饭，向学生们提供伙食并收取食宿费——通过这种方式，他于一九一四年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卜凯曾就职于一家劳动教养农场，后来遇到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由此决定去中国。

卜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到达上海，并先在金陵大学华言科（Nanking Language School）学习了几个月的汉语，后来就去了安徽宿州当农业传教士。一九一六年夏天，卜凯在避暑胜地庐山牯岭遇见了镇江长老教会牧师赛兆祥的女儿赛珍珠，并很快和她结婚。婚后两人居住在宿州，方便卜凯专心致力于农业试验和推广。由于赛珍珠从小随传教士父母远涉重洋到中国生活并上学，汉语很好，还曾翻译过《水浒》，

所以在宿州期间，赛珍珠常常充当卜凯的翻译，而卜凯后来的很多英文著作也都由赛珍珠润色。这些经历大约对赛珍珠的文学创作生涯也颇有益处——她一九三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和很多其他作品都跟中国农民有关，不得不说部分归功于卜凯这位中国三农问题专家。虽然两人后来于一九三五年离异，但赛珍珠一直在姓名中保留了卜凯的姓氏“Pearl S. Buck”，直到她去世。当然，这不是因为她跟卜凯感情深厚，而是因为这个名字在她跟卜凯离异前已成为一个文学品牌，包含着很高的无形资产。

卜凯在宿州的时候，试种了一些外国粮食品种，并找出其中适合的高产品种，分发给农户耕种——他很早就认识到，要和饥寒交迫的农民谈信仰，首先得帮助他们吃饱饭。但后来由于资金等原因，卜凯在宿州的事业遇到了困难。恰在这时，康奈尔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思委邀请他去任教，卜凯于是来到金陵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传播西方先进农业科技和管理经验方面的巨大贡献很多文献中都可看到，本文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卜凯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美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方面的教材不适合中国国情，由此决心对中国农村展开调查。他开始时劝说学生利用假期回家调查，并对部分学生的调查结果进行实地核实。根据卜凯学生崔毓俊的回忆，卜凯曾经亲自去崔的家乡直隶省盐山县农村调查，与农民交流并拍照。卜凯另一个学生熊开智说，抗战时期金陵大学迁往成都后，卜凯也曾亲往熊调查过的农户家中与农户交谈。

卜凯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对中国农村的广泛调查。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政府无力无暇



卜凯拍摄的反映中国农民的照片

组织全国范围的乡村调查。而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翰笙、薛暮桥等人所作的乡村调查，也只是部分地区的零星调查——据有的研究者说，他们只保留那些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的调查结果。费孝通等社会学家虽然也作了零星调查，但范围更为狭窄，仅限于极少数村子。日本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研究部名义进行的乡村调查（即“满铁调查”）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满铁调查以华北和华中为主，范围也不如卜凯调查广泛。

一九二七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会议决定在太平洋各国进行土地利用调查，中国作为会员国之一，也在调查之列。一九二八年冬天，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康利甫（J.B. Condliffe）与中国分会总干事陈立廷到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参观。委托该系调查中国的土地利用，并每年补贴一万美元作为经费。该调查由卜凯主持，乔启明、张心一、张履鸾、孙文郁、刘润涛、潘鸿声、崔毓俊、杨蔚、尉迟秀藻、李明良等十二人分区进行，并聘请当地人员数百人参加工作，收集农业概况、地价物价、生活水平、人口和土地利用等状况，作为发展农业、改良乡村社会的根据。此次调查，范围非常大，涉及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六十八个地区，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六个田场及三十八万两千五百六十户家庭，并将调查地区区划为两大农业地带（南方农业带和北方农

业带)和八大农区(春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西南水稻区和水稻两获区),开辟了我国农业区划的新纪元。在当时的条件下搞调查,远不是“艰辛”二字可以描述。据崔毓俊说,他远去西南边陲,深入穷乡僻壤,遭遇过多次盗匪、山洪,“几次遇险,几乎命归黄泉”。而卜凯还坚持亲自参加。据冰心文章中的说法,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三四年在包头还曾遇到前往五原与临河等地考察农业的卜凯。根据调查结果,卜凯写了三卷本的《中国土地利用》,该书一九三八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四年由帕拉贡出版公司再版。全书分三册,一为文字部分,二为地图集,三为统计资料。笔者曾见过一九四二年六月成都成城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初版,是将近七百页的一卷本。该报告详细论述了当时中国土地利用的情况和影响土地利用的自然、社会因素以及土地的最优化利用问题等等。卜凯通过大量数据,不仅记录被调查地的土地、作物、牲畜等状况,而且详细描述了当地农具、家具甚至农户穿着等情况。其结论是,当时中国农村尽管有不少富裕之家,但更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几乎没有田地、粮食和工具,只有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才是他们自己的。

与其他调查有别的是,卜凯通过调查还发现,中国佃户的比例比英国少得多,比丹麦和加拿大多得多,接近于日本和德国。通过对二十二个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六的农村信贷是由商人(或商人经营的店铺)提供的。抵押土地的情况并不常见,只占农民信贷的百分之一。尽管在某些地方有地主或商人放高利贷,但是这些情况并不具有代表性,全国范围内情况并非如此。对一万多个村子的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向地主贷款要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向亲戚朋友借贷也要付出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八的利息,而向商人借款则付百分之二十一利息,只有一个地方的宗族组织例外,向贷款人收取百分之四十二的利息。而中国农民银行对农民合作社收取的利息最低,是百分之十二点一。

《中国土地利用》之外,卜凯关于中国农村调查的著作还有其博士论文《中国农家经济》。卜凯调查成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发利用的宝藏。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在其名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多次引用卜凯调查。不过该书中文版把卜凯翻译成了巴克。卜凯的中文译名有卜凯、布克、卜克、勃克、巴克等多种,但通晓汉语的他长期使用的中文名字是“卜凯”。

此外,日本的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一九九〇年代以来利用卜凯调查等资料建立了中华民国时期农村经济数据库,成为民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他受益于卜凯著作。地理学家陈述彭早年曾研读过卜凯著作。而何炳棣的《明初以降的人口及其他问题》、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都利用了卜凯调查。

卜凯在农村问题的理论探讨方面也有贡献,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普遍重视。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H.Myers)认为,中国近现代有三派主要的农村问题理论,分别以马克思主义者、费孝通以及卜凯为代表。由于卜凯掌握的事实最多,最全面,而在理论建构方面又最为严谨,因此卜凯的农村问题理论最为可靠。卜凯的农村理论著作主要是卜凯在一九四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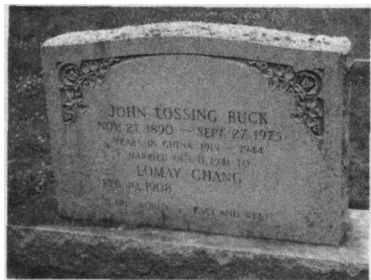
九月提交给在英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协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第十届大会的论文《中国一些根本的农业问题》(*Some Basic Agricultural Problems of China*)。马若孟在一九七九年把卜凯的另外两篇文章《中国的农地所有制和租佃》、《四川省农业调查》跟这篇文章放在一起,编辑出版了《三篇关于中国农家经济的文章》(*Three Essays on Chinese Farm Economy*),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可看到该书。除了《中国一些根本的农业问题》外,卜凯还写过《关于中国土地的事实和理论》,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份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

中国农村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卜凯在《中国一些根本的农业问题》中都有精彩论述。茅于軾关于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利率过高的论述引发争议,而卜凯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已对该问题有深刻认识。卜凯认为信贷风险、单个贷款数额小和贷款基金的匮乏使得利率过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卜凯对农业机械化的论述也令人印象深刻。卜凯认为只有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财力增加之后,农业机械化才可能成功实施。笔者的家乡河南省商城县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过去几十年,当地政府一直提倡农业机械化但收效甚微,大量青壮年农民成群结队地围着打牌或者打台球的情况屡见不鲜。而现在,在农村留守的主要是老弱病残,这些老年人干农活体力不支,只好通过机械耕作,加上在外务工的子女也时常寄钱回家贴补购买或雇佣农业机械的费用,于是农忙季节,商城县的农村到处可见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农村劳动力匮乏和农民财力增加使得农业机械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卜凯六十年前的预测完全吻合。早在一九四七年,卜凯说:在绥远、

宁夏和新疆有些土地可以被集中灌溉,但其规模受到水资源供应的限制。在很多国家,农民把原本丰腴的牧地转化为贫瘠的耕地,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些土地,同时浪费了政府的时间和金钱——因而,专家的仔细调查对于土地开垦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卜凯对农业集体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农业集体化不会提高农业生产率。这又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农业历史不谋而合。

除了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调查外,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卜凯还曾经受罗斯福总统的任命,担任美国财政部货币顾问,调查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对银本位的中国的影响。他领头进行的中国银价研究显示,美国白银收购政策造成中国银元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纽约州达奇斯县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陈列馆收藏有卜凯对中国通货膨胀的调查结果,主要包括卜凯撰写的报告《对中国萧条的简短陈述》(*A Brief Statement on Chinese Depression*, 标的日期是1934年12月26日)和《来自卜凯教授的电报》(*Paraphrase of Cable Received from Professor Buck*, 标的日期是1936年3月14日)。笔者的忘年交 Daniel W Upton Sr. 先生在前往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陈列馆查看卜凯资料后表示,当时美国坐视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没有采取措施帮助中国,令他感到很愤怒。

据卜凯的农村调查和通货膨胀调查分析,当时国民政府垮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的贫穷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过高。这也是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发生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英国、美国之所以能走上温和的改良道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比例较低。从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中



卜凯墓碑

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贫穷人口所占的比例很高。第二个原因是过度的通货膨胀。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造成银本位的中国通货膨胀严重,从而导致国民政府垮台。笔者父亲小时候居住在南京和桂林,也目睹了国民政府崩溃前的过度通货膨胀:大陆易帜前夕,南京居民抢购实物,例如布匹;在桂林,商店店主拒绝收法币,甚至白天不开门,晚上开门,只收银元和美元,解放军占领桂林后一度仍然如此。

卜凯于一九三五年与赛珍珠离异。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一日,与秘书张乐梅(音译,英文名Lomay Chang)结婚。张乐梅出生于崇明岛上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画家和学者。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卜凯在纽约州达奇斯县波基普西与世长辞。其时,距离他的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两个月。据一位在一九七一年购买了卜凯在美国纽约州达奇斯县农庄的老人Frank J.Doherty说,卜凯农庄住宅的布置颇具东方色彩。而卜凯墓碑上镌刻的文字,也显示着他对东方世界的感情:

约翰·洛辛·卜凯

1890年11月27日——1975年9月27日

1915年——1944年生活在中国

1941年10月11日与张乐梅结为夫妻

(张乐梅生于)1908年2月10日

两个世界——东方和西方

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军人是推动全球

化的主要力量。卜凯作为农业传教士来到中国,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农业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卜凯主张乡村改良,不赞同暴力革命,其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左派学者陈翰笙、薛暮桥等人还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大力批判卜凯,由于当时他们在大陆学界和政界地位、威望都很高,所以卜凯的得意门生和同事(他们大都在美国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基本上都命运坎坷,事业报废。解放后,大陆再也没有出版过卜凯的著作,只有极少数图书馆还保存有很旧的民国版本,卜凯后期的著作至今还大都没有中文版本,这使得卜凯在大陆鲜为人知。甚至连林毅夫等学者也在论文中沿袭了陈翰笙、薛暮桥等民国时期过度贬低卜凯的说法。相比之下,卜凯在国外的知名度远大于中国国内。在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出版当年,日本就出版了两个日文译本。海外研究民国乡村的学者几乎都绕不开卜凯。卜凯在民国时期的声名似乎远远大于现在。胡乔木也曾经跟人说卜凯民国时期名声很大。卜凯虽然主张温和的改良,但是卜凯也认识到改良只有在“对人民有信心并且能够激发起人民的信心的政府”的主持下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还在社论中引用卜凯的话,以呼吁国民党当局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

在三农问题重要性被充分认识的今天,重新认识卜凯的思想遗产,也是很有必要的。

承蒙美国纽约州达奇斯县的老先 Daniel W Upton Sr. 为我辛苦收集材料,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